

武汉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丛书

音乐理论与 音乐学科理论

蔡际洲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音乐理论与 音乐学科理论

第二版

李惟宁

J60-53/2

2007

武汉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丛书

音乐理论与 音乐学科理论

蔡际洲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 / 蔡际洲著.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6

(武汉音乐学院丛书)

ISBN 978-7-80751-139-7

I. 音… II. 蔡… III. 音乐—艺术理论—文集 IV. J6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2811 号

书名: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

著者: 蔡际洲

责任编辑: 方立平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营销部电子信箱: market@smph.sh.cn

编辑部电子信箱: editor@smph.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9 $\frac{1}{3}$ 谱、文 338 面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80751-139-7/J · 111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65419327

自序

与音乐结缘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了。最初还只是一种爱好,到后来逐渐发展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种种梦想:想成为演奏家,还想成为作曲家……遗憾的是自己生不逢时,赶上了“十年文革”。因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代不仅不可能圆梦,而且连读书、受教育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是音乐,伴我走过了知青时代;还是音乐,使我在专业文艺团体中以演奏和作曲为业。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到高等音乐院校从事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则是近 20 余年来事。在我看来,自己的音乐道路有着从舞台到讲台这一过程,虽然都为音乐,但前为艺术,后为学术。其间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人生角色、工作环境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转换。与音乐学界诸同仁相比,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

记得在 1981 年冬天,我拿着自己撰写的第一篇论文习作,来到湖北艺术学院(现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找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刘正维先生请教,即可看作是自己音乐学术道路的开始。改革开放之初,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也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点”由练琴、作曲向读书、思考这方面转移。后来,有幸赶上“末班车”——在刘先生的门下学习,攻读硕士学位,从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人生。

这部文集收入了我从事音乐学教学与研究以来的 30 余篇论文,聊作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为学科建设之需,近来常盘点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旧作。特别是读着多年前的那些文字,时常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而感到汗颜。近年来,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和自己的研究旨趣,一方面探索音乐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积极倡导音乐学学术规范的研究。但从自己多年前的若干论文看,不合今日学术要求之处甚多。

故此,我的一些研究生曾问我,你以前的论文为何也有不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我说,由于中国的学术规范尚在草创之中,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倡导学术规范的人,自然也曾有过“失范”的时候。因此,这些发表于不同年代的论文,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笔者在音乐学术道路上探索过程的记录。其中的问题、缺失,乃至“失范”等等,我也不打算去改动。恰恰相反,按原始面貌保留,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诚然,从另一方面看,假如我所做的这一点点工作,能为中国音乐理论大厦添上一块砖的话,那么这也是与历代学人长期的学术积累分不开的。因此,我对引领我走上音乐学术道路并给我以教诲和帮助的师长,始终存有感激之情。他们是:业师刘正维先生,还有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史新民、周振锡、郑荣达诸先生,以及黄翔鹏、董维松、赵宋光、冯光钰、乔建中诸先生,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还有,武汉音乐学院良好的学术氛围,音乐学系深厚的学术传统均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我还特别怀念已经辞世的父母。对他们,我不仅感激养育之恩,更以他们的人品、学识为楷模。二老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所学虽为非音乐专业,但对我的影响至深。因为在学术这一层面上,音乐与非音乐之间的某些东西都是相通的。特别是父亲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的精神,母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都是永远激励我的动力。

二

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可以看得出最初更多是立足于民族音乐学,其对象大多为中国传统音乐中某一品种的“个案”研究;后来,在这一领域也渐次产生将研究视角转移至“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向。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对国内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学术视野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一种有力的渗透和补充。“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曼特尔·胡德语)”的学术理念,既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共识,也对自己的研究发生着重要影响。因为,作为人类公认的探求科学真理的三种模式——“是什么的知识、为什么的知识和怎么办的知识”——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我也十分注意对我们既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比如,我院杨匡民教授、刘正维教授的那些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也给我以十分重要的启迪。

特别是他们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播与流变中的“曲调考证”等方面的学术积累,不仅在研究范式上是我等后学的楷模,而且也应成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如何彰显自己学科特色的重要参考。

此外,由于自己有着多年在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担任编辑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高校学报研究会”上与武汉地区其他学界同仁的学术交往,遂使自己的研究兴趣还扩展至音乐编辑学和音乐学学科理论。1996年,我曾在《黄钟》上发表过《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一文。尽管10多年过去了,该文今天看来十分粗浅,但其基本主旨依然是我治学的指导思想。即,作为一位音乐学者,一方面要有具体的“音乐理论”研究;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对各种已有的研究作些思考——为建构“音乐学科理论”而探索。没有前者,后者则为空中楼阁;没有后者,前者将失去明确的方向和难以达到一定之高度。诚如黄翔鹏先生当年所倡导的“虚实并务”一样。只是对当下的中国音乐学术而言,更应注意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建设,特别是关于其中学术规范的研究与思考。因为某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毕竟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时,没有“游戏规则”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

三

学问之道,甘苦自知。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武汉音乐学院领导杨锋教授、彭志敏教授的大力支持;还得到音乐学系副主任孙晓辉博士、王洪军博士的关心和帮助,音乐学系学生李娟、莫沅等为我作了不少编务工作。还须提及的是,曾经发表拙文的音乐理论刊物——《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交响》、《音乐探索》、《人民音乐》、《黄钟》等及其诸编辑同仁,是他们的厚爱和辛勤劳动,才使拙文得以面世。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收入本书中的论文按研究领域可大体可分为音乐学学科理论、民族音乐学、音乐编辑学、音乐教育与音乐评论等。拉拉杂杂,不成系统,水平有限,谬误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

蔡际洲

2007年6月 谨记于武昌两湖书院

目录

自序 1

1.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 1
2. 音乐学学术规范论略 9
3. 音乐学学术研究规范 27
4. 音乐论文的写作基础
——音乐论文写作系列研究之三 47
5. 音乐研究的角度 58
6. 黄翔鹏先生的音乐学科理论思想 70
7. “辽金北鄙”遗音与南北曲音乐之渊源
——兼论“蕃曲”在戏曲声腔史中的地位 78
8. 从宫观乐派到民俗乐派
——兼论武当道乐中趋同与求异的现象 123
9. 戏曲音乐的表现因素与逻辑因素
——关于全剧音乐材料构成规律的探讨 137
10. 当代中国戏曲音乐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向 140
11. 传统戏曲音乐与现代戏曲音乐的文化比较
——关于“程式化”与“非程式化”现象生成原因的探讨 151
12. 京剧抒情性唱段句幅变化的统计学研究 164
13. 清代戏曲音乐 177
14. 皮黄腔的流布与影响 185
15. 民歌研究三题 192
16. 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196

2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

17. 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 208
18. 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中国音乐家研究 224
19. 从思维方式看中西音乐之比较
——关于中国音乐研究与创作的哲学反思 237
20. 武汉市百乐门歌舞厅音乐调查 246
21. 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 254
22. “民族音乐”及其几个相关的概念
——编稿琐记之一 276
23. 音乐学术论文中的“重复”现象
——编稿琐记之二 280
24. 也谈注释、参考文献的规范化问题
——编稿琐记之三 289
25. 音乐学考生的专业素质与考试科目 297
26. 研究生学年论文中的若干问题 306
27. 音乐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评估 310
28. 当前研究生教学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关于扩招的反思 319
29. 腔式板块理论与音乐地理学 325
30. 关于“节歌”的思考 329
31. 防范与建设:治理学术腐败的重要途径
——呼应孟文涛、居其宏二先生 332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音乐学术界逐渐产生了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即本文所说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学科理论。

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音乐理论是指人们在对音乐及其相关的诸种文化脉络的各种研究中所总结出的理论。比如不同历史时期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各民族各地区音乐的形态特点及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音乐的本质特征与美感特征;音乐与不同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的关系;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技术、技巧等等。音乐学科理论则是指人们对音乐理论研究现象的再抽象,是说明、阐释和研究、探讨音乐理论研究的理论。比如音乐学(或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目的、对象、任务、方法;音乐学(或某一分支学科)研究的历史沿革和学科的发展规律;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分类和构成状况;音乐学家的音乐观念与知识修养;对音乐理论文献的评价与治学经验的总结等等。简而言之,音乐理论是研究音乐怎么样的理论,音乐学科理论是怎样研究音乐的理论。

诚然,从广义上讲,音乐学科理论也是“音乐理论”,因为它也是关于音乐的理论研究。不过在本文中,为了说明问题和讨论问题的需要,特将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研究对象称为“音乐理论”和“音乐学科理论”。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究竟是否妥当?是否准确?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和探讨。鉴于中国音乐理论界的现状,本文特将我国音乐学科理论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其与音乐理论的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

一般说来,人们对音乐理论的研究是自古有之,然而,对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

则是很晚的事了。不过,较系统地进行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虽然产生较晚,但属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常常早就零星地散见于各种音乐理论的研究之中。比如在西方,古希腊的阿里斯提得斯·昆提斯安就曾在《论音乐》这部著作中,将音乐分为理论、技术、演出三大类别;在中国,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在其《律学新说》中对中国历史上一切生律法的重新审视与研究等等,均可看作是早期的研究。此外,即使在当代的音乐理论研究中,也能经常见到这种属于音乐学科理论性质的内容——即两种理论的交叉现象。比如在许多音乐学术论文(特别是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前言或引论中,关于该文的研究主旨、研究起点与研究方法;对该论题范围内已有文献的评述等即是。当然,这仅仅是对这一具体课题的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如果将其扩而大之,再从音乐学(或某一分支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那么,它就是这一学科的音乐学科理论了。

19世纪中叶以来,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在西方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克吕桑德的在其所编《音乐学年鉴》第一卷中的序言和阿德勒的《音乐学的领域、方法及目标》等文献,可谓是西方近代音乐学科理论的先声。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文献当推萧友梅先生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学报》上发表的《音乐的定义与分门研究》,该文可看作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篇专论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献。萧友梅先生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音乐研究的若干门类:乐谱、乐典、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音乐形态学、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等。1920年,萧友梅先生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音乐杂志》上又发表了《乐学研究法》一文,明确提出“乐学是研究音乐的科学”,并对其五种研究方法(或曰角度)——声学、声音生理学、音乐美学、音乐史作了较详细的阐释。其后,又有冼星海于1939年发表的《民歌研究》和吕骥发表于1948年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这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研究中国民歌以及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的范围和所应研究的问题等等。虽未从建构某一学科或某一体系为出发点,但理应成为中国音乐民族学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特别是吕骥的文章,对我国后来关于民间音乐的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产生很大影响。

1949年建国后至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比建国前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因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这种研究的特殊性——“对音乐理论研

究的研究”，许多文章都将学术问题纳入到“大批判”之中，不能不说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正常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以1958年创刊、1960年8月停刊的全国性音乐期刊《音乐研究》为例，3年中共出15期，发表论文总计195篇。其中属音乐学科理论的有27篇，占总数14%。在这27篇论文中，大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而被打上“大跃进”年代的烙印。当然，也有少数文章将这一研究作为学术问题看待的，其代表当推阴法鲁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一种新途径》（1958年第5期）和李纯一先生的《关于几个中国古代音乐史问题的商榷》（1959年第1期）。10年文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音乐的理论研究是一片空白。纵观这一历史阶段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学科理论，无论是从各自的数量上看，还是从所研究的问题上看，二者尚未形成明显分工的态势，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显得更为薄弱。

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学术理论的繁荣。不仅音乐理论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表现为打开国门，积极翻译、引进国外音乐学科理论的资料文献。1981年，在《音乐研究》（1980年复刊）上开始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批介绍国外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章，有《音乐学》（何乾三）、《民族音乐学》（俞人豪）、《音乐社会学》（罗传开）、《音乐心理学》（张前）；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董维松、沈洽）；其后，人民音乐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介绍国外音乐学科理论的“音乐词典词条汇辑”：《民族音乐学》（1988年）、《音乐社会学》（1990年）等等。这些国外资料文献的翻译和介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音乐理论特别是音乐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音乐界对音乐学科理论建设的日益关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更有所拓展，出现了80年代以来的“方法论”热潮。现以创刊于1985年并在国内外音乐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全国性音乐季刊《中国音乐学》为例，略去1985年创刊号不计，将从1986至1995年这10年间，发表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学科理论文章列表分析。

从下表中可看出，10年内《中国音乐学》共出40期，发表论文总计702篇，属音乐学科理论的计有225篇，占总数的32%。从这一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中，可以管窥我国音乐理论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两种理论研究的概况。尤其是1986—1989这4年中，学科理论的文章占总数之比例平均为41%，其中也隐约反映了80

年代的“方法论”热潮。90年代以后,热潮虽有所退温,但人们并没有停止对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只是在态度上更为谨慎、冷静一些,表现出一种重新思考的征兆。

年代 篇数 类型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总计
	音乐理论	43	51	51	39	55	47	48	54	49	40
音乐学科理论	51	27	35	18	19	17	12	14	12	20	225
合计	94	78	86	57	74	64	60	68	61	60	702
学科理论占 总数之比例	54%	35%	41%	32%	26%	27%	20%	21%	20%	33%	32%

至此,可以说在中国音乐理论界的研究对象中,已开始出现了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明显分工的发展态势,两种理论并存的研究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

从以上粗略的历史考察来看,可以说明我国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先后产生的大体情况。从中也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规律。音乐研究的历史表明,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的分工,是音乐科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特别是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状况,更是衡量音乐学(或某一分支学科)学科建设成熟与否的标志。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分工是一种发展趋向。当代学术的发展就是以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越来越强为特点的。

如何看待这两种理论的关系,是目前我们必须弄清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可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在“音乐研究”这一范畴中,音乐理论的研究具有操作层面上的含义,是“理论研究中的实践”;而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则具有说明层面上的含义,是“理论研究中的理论”。依笔者的愚见,尽管目前在我国音乐学术界已初步形成了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格局,但在观念上仍有种种偏见,在研究中尚存种种问题。诚然,笔者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对这二者的关系作全面、深刻的论述,仅将其中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

其一：音乐学科理论在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应如何看待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

一般说来，我们对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至今，不少人还认为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是空谈。人们常说，搞研究就搞研究，不要奢谈这个学那个学的。甚至有人将写这方面文章较多的学者戏称为“空军”（意即专说空话），认为他们专写指导别人怎样研究的文章，自己却不搞具体的研究。究其原因，可能与我们民族的务实心理、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对此，王国维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指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到自觉 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因此，国人多习惯于具体的研究，而不大喜欢探讨一下怎样进行研究。在近一个世纪以后，当学术界其他学科已基本改变上述状况时，音乐界对建立学科理论持否定态度者仍不乏其人。以致有些学者在撰写学科理论文章时，总不敢理直气壮，总是躲躲闪闪地在文中一再申明：“本文无意建构××学科”、“本文无意建构某一体系”，等等。

然而，目前无论是在音乐的高等院校或是在科研机构，凡谈及规划、远景、目标等时，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等热门话题。不过，大多所论及的是具体的科研课题（音乐理论）、人才梯队、科研经费等问题，鲜有音乐的学科理论。如果对某一学科来说，仅有人才、经费和音乐理论研究成果，而无该学科的学科理论成果的话，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发展程度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连自己的目的、对象和方法都弄不清或说不出的学科，它的研究只能是还停留在“感性”阶段，至多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在教学中，笔者作为一名音乐学专业的教师，在与大学生、研究生的接触中对此也深有感触。特别是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在学习中对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寻求知识的途径。目前，“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是他们最感困惑的问题。而在我们音乐学系的课程设置上，音乐学科理论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据笔者孤陋寡闻，目前在国内9所音乐学院中，开设有音乐学科理论课程的仅有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学概论》和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概论》。如前述《中国音乐学》杂志上所发表的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章倒是不少，

但这些成果大部分尚未编成教材,走进课堂,致使许多研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我们如果看看学术界其他学科的情况,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比如在史学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就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科研方面,他们不仅有专门研究“历史理论”的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还有专门研究“史学理论”的刊物《史学理论》。在教学方面,既有《××通史》、《××史》等“历史理论”课程,还有专门介绍本学科目的、对象、方法以及国内外各种流派的“史学理论”课程——《历史科学概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学科理论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学科学。这是对某一学科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整理和反思的学科。学科理论不仅能对关于研究客体的种种现象予以阐释——给人们以该学科具体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而且还能揭示研究主体的种种奥秘及其与研究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完成人们对所研究对象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了学科理论的指导,理论研究可由散兵游勇式的“投石问路”变为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集约化”攻关。在学术界,我们不能不承认音乐的学科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在文、史、哲等大学科面前,我们音乐学科只能算是个小弟弟。因此,音乐理论的研究要想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就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其二:如何看待音乐学科理论中的中西关系? 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之立足点是什么?

音乐理论有中西之别,音乐学科理论难道也有中西之分?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与自然科学不同,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全人类共用同一学科理论。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可能有一致的学科理论的。即使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有个“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前些年的“方法论”的热潮中,由于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理论而产生的种种误区,也是未处理好音乐学科理论的中西关系所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人在建立学科理论方面确实是其所长。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由于西学的传入,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近现代学术理论建设的繁荣,中国音乐学科理论的先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学科所不同的是音乐学科的先天不足——中国的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是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母语”的丧失,在培养的几代音乐家中,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者还有很大市场。人们不仅认为中国的音乐理论落后,

而且还容易将这一观念平移到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中来。这在高举“文化价值相对论”大旗的民族音乐学界也未能幸免:比如人们常常言必称“孔斯特、梅里亚姆、内特尔”,而较少有人在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同时,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从学科理论的角度进行认真的总结。似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完全适合中国的研究实际,完全可以指导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诚然,对西方的音乐学科理论取一种不接触、不了解、不学习的态度,实为观念上的封闭和保守。但笔者以为,西方人治学的方式和西方的学科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疑,前者是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和积极引进的,后者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必须与“中国的研究实际相结合”。

在目前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中,透过种种纷繁复杂的研究,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两种研究倾向:一是主张借鉴西方音乐学科理论和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首先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建立起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一是主张从中国音乐研究的实际出发,大量积累具体的研究规律,然后再整理成系统化的学科理论体系。可以说目前的各种研究均可归于上述两大体系之中,笔者姑且将前者称为“框架论”,后者称为“积累论”。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拟对这两种研究倾向的得失进行评价。不同研究倾向的产生,是音乐学科理论繁荣的体现。无论是“框架论”也好,还是“积累论”也好,从中反应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一般到个别和由个别到一般的基本规律。但笔者以为有两点是必须肯定的:即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打开思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还必须立足于大量的具体研究“实践”——音乐理论,从中总结出阐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来。

三

综上所述,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这两个研究领域在中国音乐理论界已是客观存在。作为一个音乐理论家,似乎不应只进行音乐理论的研究,而不了解、不涉及音乐学科理论,从而对自己的研究作些必要的反思;或者说只搞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而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不屑一顾。诚然,这二者在每个学者身上是不可能平分秋色的。但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各有所侧重,再加上我们都能少一点偏见,多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容忍,那么将会对我们的理论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还须对本文的归属作一说明:就研究对象而言,本文亦属一篇关于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章——“对音乐理论研究现象的再抽象”。不过,该类文章一般似应由“资深专家”撰写,以确保其在音乐理论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像笔者这样的“资浅学人”写此文章,不仅勉为其难,更有“指导”他人之嫌。然而,笔者却以为拙文不过只是一点随感,姑妄言之。故不揣浅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版。
2. 《世界教育》,1905年第96号。
3.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4. 《中国音乐年鉴》(1987—1994)。
5. 《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1960年第3期。
6. 《中国音乐学》1985年创刊号——1995年第4期。

(原载《黄钟》1996年第2期)